

DOI:10.13216/j.cnki.upcjess.2016.05.0014

旅行理论——西方归化和异化在中国的传播

尹衍桐

(中国石油大学 文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以赛义德的旅行理论为依据,考察归化和异化在中国的旅程颇具意义。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西方的归化和异化理论进入中国以来,遭到的抵制极少,几乎被全盘接受,加入并推进了国内的直译和意译之争,但是也遭到了极大的改造,被简化为技术转换和具体的方法,广泛应用于各种翻译,原本提倡异化的唯一选择变成了辩证调和的选择,原本因与伦理和政治等关联而体现出的叛逆色彩消失殆尽。改造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固有的思维惯性和定势,包括整体性模糊直觉思维、二元对立与中和思维、去语境化思维等。同时体现了它们在新的接纳条件下不得不被同化、被驯化的情形。

关键词:翻译;归化;异化;旅行理论;传播;改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5-0075-07

一、引言

归化和异化之争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最显著的现象。这一理论发轫于西方译界,进入中国后迅速地被接纳和改造,其过程深刻而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接受西方译论乃至西方文化的过程、现象和深层原因。赛义德(Edward Said)的旅行理论为我们考察这一过程提供了科学的参照。赛义德以形象的比喻提出观念和理论“从人到人,从情境到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旅行,并描述了旅行的四个阶段: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于起点的使观念得以生成或进入话语的初始环境;其次,有一段穿行的距离,一条穿越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一个时空点,获得新的突显位置;再次,有一些条件,可以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条件之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的抵制条件,这些条件使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被引入并容忍;最后,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改造。^{[1]227}

下文中笔者试图按照这四个阶段分析归化和异化在中国的传播,考察该理论在这一旅程中的具体

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自身的改变及深层原因,探讨其从西方的语境来到中国后是获得还是失去了力量。

二、起点:从施莱尔马赫到韦努蒂

按照目前普遍接受的看法,归化和异化思想的源头可上溯到德国的施莱尔马赫(1768—1834)。他于 1813 年在柏林所作的《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提出翻译的路径只有两种:译者要么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把读者引向作者,要么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把作者引向读者。^[2]

施莱尔马赫在解释学框架中理解翻译。针对“天才”文本,即艺术和哲学的翻译困难,他提出译者要凭借自己对原文写作时的语言知识,把自己从原作那里所接受的同样的意象和快乐传达给读者,把读者带到译者自己所处的位置,使作者和读者相会。他继承了德国自路德以来认为翻译与民族语言发展和民族身份紧密相连的传统,顺应德国当时因“抵抗法国”而反对“法式翻译”的思潮,认为第一种翻译是真正可靠的翻译,因为它可以实现翻译的历史的总目标:通过与异域语言文化的广泛接触发展壮大德国的语言,发展和保存德语语言中的精华,把

收稿日期:2015-12-30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1CWZZ13)

作者简介:尹衍桐(1970—),男,山东日照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教学。

异域的科学与艺术珍宝统一于自己的语言,形成历史的总体,保存在作为欧洲中心的德国。施莱尔马赫要发展一种译语语言,认为第二种方法——“翻译就像原作者用译入语写作”——不仅是不可达到的,而且自身也是无效的,适用性非常有限,几乎为零。^{[2]41-63}

施莱尔马赫之后,法国的贝尔曼(Antoine Berman)把翻译方法与伦理联系起来。他认为翻译行为的伦理目标是:接纳作为“异”的“异”。^[3]他质疑把原文同化为译入语语言和文化而导致原文“变形”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列出了12种导致原文“变形”的倾向,其结果都是生产一个比原文更“清晰”、更“优美”、更“纯”的文本,都为了意义而破坏了文字。贝尔曼因而提倡“直译”,意思是“依附于原作的文字”。这种翻译,一方面还原作品的表意过程,另一方面,改变翻译语言。贝尔曼认为后一方面是翻译的构成性作用。

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把施莱尔马赫的两种方法命名为归化和异化。针对英美国家“通顺流畅”的透明翻译中所隐含的暴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译者的隐身,他认为贝尔曼的伦理策略不能提供解决的方法,而必须从政治的角度使用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方法。他提倡异化的翻译,即通过瓦解目标语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准则,标举外国文本的差异性。他指出,异化翻译寻求抑制翻译中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在当今是非常可取的,一种对当今世界事务的战略性的文化介入,反对英语国家霸权、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可以看作一种抵抗,抵抗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和帝国主义,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4]

施莱尔马赫、贝尔曼和韦努蒂都反对归化,提倡异化,他们各自的背景和使用目的既有共性,又有着明显的差别。施氏立足于解释的艺术,带有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但其目的又与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和民族对抗的现实不可分割;贝尔曼侧重翻译行为伦理,其主张被道格拉斯·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称作“温和的直译”^[5],两者都突出翻译发展译入语语言的作用;韦努蒂则极力突出翻译的政治,其主张带有强烈的暴力反抗色彩。

三、归化和异化在中国的旅行

(一) 旅行在中国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西方的归化和异化进入中国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引介而进入。事实上,西方的阐释学思想,包括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思想,进入中国都要远早于

韦努蒂理论进入中国的时间。例如,钱钟书于1964年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即借鉴了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分析翻译的两条路径:“就文体或风格而论,也许会有希莱尔马柯区分的两种翻译法,譬如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6]谭载喜在1991年出版的《西方翻译简史》中也介绍了施莱尔马赫关于翻译的两种途径。^[7]可见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思想早已引入中国。虽然如此,国内归化和异化论的热潮和施莱尔马赫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国内译界在运用这对范畴时不仅极少追溯到施莱尔马赫,也较少运用阐释学的理论。本世纪初,国内连续出现了研究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论文,如王雪、胡叶涵^[8],王雪、胡叶涵、谷婷婷^[9],王雪、王立松、李旭^[10],韩宁^[11],陈早^[12]等。这些研究涉及到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哲学渊源、文化背景、翻译思想及其对西方译论的影响等,但从时间上已然落后于国内归化和异化论的热潮,其成果也鲜见应用于分析国内的归化和异化。不过,国内学者在引用归化和异化这对范畴时,一般都会连同韦努蒂对施莱尔马赫的引用一起照搬。考虑到韦努蒂和施莱尔马赫的渊源,以及国内归化和异化论的实际情形,韦努蒂充当的角色,可以看作施莱尔马赫翻译方法旅行到中国的途经之地,严格说来,则可以看作归化和异化论进入中国旅行的真正起点。

归化和异化思想进入中国既是偶然的,又有其必然性。偶然性是指它可能是中国的学者与之偶然相遇,并把它介绍给中国学界;必然性则是指它的进入迎合了当时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学术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目前所见国内文献中,郭建中在1998年发表在《外国语》的题为《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和归化》^[13]一文,可以看作国内归化和异化热的一篇种子论文。首先,该文参考西方译论,可以显示中国对西方这一范畴的解读和使用的发端。该文引用了韦努蒂以及施莱尔马赫等人的文献,并参照西方翻译史的翻译事实和现象解释归化和异化的使用情况以及在翻译史上的趋势。其次,该文对归化和异化各自的理由进行了全面的概括,为后来国内归化和异化论者定下了基调。分析其后国内有关归化和异化论的研究文献,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支持归化还是异化,其观点和理由都无出这篇文献中所做的总结。再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的《红楼梦》翻译为例,

分析了归化和异化各自的特点和长处,成为其后国内以归化和异化策略进行翻译批评的模板。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该论文中所参考的文献是韦努蒂1991年的文献,并不包含后来韦努蒂全面阐释归化和异化策略的《译者的隐形》等文献,使用的英文术语是 alienation 和 adaptation。之后,郭建中在1999年出版的《当代美国翻译理论》^[14]以及2000年发表在《中国翻译》杂志上的《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15]中,详细介绍了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其他较早使用归化和异化术语的作者还有:谭慧娟于1999年在《中国翻译》杂志发表《从文化差异与渗透看翻译的异化和归化》一文;陈丽莉于1999年在《中国科技翻译》杂志发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一文;孙致礼也在1999年的教材和之后的论文中使用这对术语。至此,归化和异化范畴进入并开始了在中国旅行的第一阶段。

归化和异化范畴进入中国之后迅速被接纳,引发了一场有关翻译方法的大讨论,并把国内的直译和意译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们被拿来取代了直译和意译,并广泛应用于翻译评价,不仅《红楼梦》《飘》《浮生六记》等众多名作名译被套用了这对范畴进行评价,政治文献、商业品牌、广告、电影、新闻、旅游、民俗文化、文化词语、成语谚语、人名地名等翻译也出现了围绕此范畴的讨论文章。同时,国内对归化和异化的含义以及两者孰是孰非展开了矛与盾的交锋^[16],主要的焦点围绕:归化和异化是否等同于直译和意译;翻译中应该坚持归化还是异化。也有学者拿异化、归化和国内的归化、洋化范畴进行比较。譬如,有学者如崔永禄^[17]、王东风^[18]等认为,鲁迅的“洋气”和韦努蒂的异化基本上是一回事。

在这场论争中,西方译论的大量涌入、原版译论的直接引介,譬如根茨勒(Edwin Gentzler)的《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贝克(Mona Baker)主持编辑的《翻译大百科》(*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8)、沙特沃斯和考伊(Shuttleworth M. & Moira Cowie)主编的《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7)、韦努蒂本人的翻译理论著作,以及西方学者关于韦努蒂翻译思想的批评等,都加剧了归化和异化范畴在中国的传播,加深了国内对这对术语的理解,从而促进了它们传播的第三阶段:正本清源。早在国内的论争开始不久,即有学者意识到国内对待西方译论存在的问题。林克难在2001年发表的《为翻译术语正名》一文中指出归化和异化在国内的

“同化”现象。^[19]此后,他在2003年发表的《外国翻译理论之适用性研究》^[20]一文、葛校琴在2002年发表的《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21]一文,都批评了国内忽视韦努蒂归化和异化论提出的后殖民语境。贺显斌于2008年在《外语教学》发文,指出了韦努蒂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误读。^[22]杨红梅则认为,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误读实际上是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的本土化,呈现了“变异”的本土色彩。^[23]

在一些学者批评国内译界“误读”“异化”“本土化”韦努蒂翻译思想的同时,韦努蒂翻译思想也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借助于论文、专著、硕士学位论文,以及韦努蒂著作的中文翻译,全面介绍、分析和揭示了韦努蒂翻译思想的方方面面,反思早期引入归化和异化论者的认识误区。蒋晓华和张景华于2007年发表《重新解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兼与郭建中教授商榷》,提出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七种内涵,并反对把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看作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将其定位于翻译的文化研究派。^[24]郭建中也于2008年发表了《韦努蒂访谈录》^[25],2009年又发表了《异化与归化: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第二版评述》^[26],介绍了韦努蒂本人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的修正,以及针对译论界对他的误读和批评进行的澄清和反驳。

(二) 中国接纳归化和异化理论的历史条件

归化和异化进入中国后,中国当时的翻译研究现状及学术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为早期接纳归化和异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和思想的解放,中国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短短的十几年内,西方各种理论思潮涌入中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人文学术盛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研究也迅速发展,中国译界一方面沿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体系梳理丰富的传统译论,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系统、科学的语言学翻译理论,特别是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更是在中国盛极一时。在中西译论的碰撞和融合中,有关翻译方法“归化和洋化”的争论即是翻译争论的一个热门焦点。刘英凯于1987年发表《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批评归化翻译的种种弊端及其表现,一直到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这场争论,实质上还是直译和意译之争,焦点主要落在语言层次上。譬如,刘英凯认为:“‘归化’的翻译,归根结蒂,是意译的极端。而移植法再现原文的‘洋气’,则是

最大程度的直译。”^[27]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传统译论的狭隘和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局限性突显出来。由于一直专注于讨论语言层面上如何做到“忠实/对等”、直译还是意译、语义对等还是形式对等等技术问题,翻译研究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进入了一个相对的“理论沉寂期”^[19]。面对“翻译研究何去何从”的困境,国内译界一方面开始反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将目光转向西方译论中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功能主义、比较文学和文化翻译理论。这些理论对语言学翻译理论发出的挑战使国内译界认识到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局限,译文为中心、目的(Skopos)、描写、摆布(manipulation)、解构、规范、话语权利、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等译学话语也令国内学者们大开眼界。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理论就是随着这股文化翻译热进入中国,并与国内的“直译和意译”“归化和洋化”相汇合。

(三) 抵制

归化和异化范畴进入中国后,呈现出一种被全盘接受的态势。虽然有学者清醒地指出国内对这两个术语的“误读”“同化”等问题,但是,这些批评将矛头对准的是国内译界而不是韦努蒂。与韦努蒂的异化理论在欧美译论界遭到各种批评不同,国内反对和批评的声音则很小,仅有的批评和反对,也往往是借鉴或受到欧美学者的影响。例如,刘泽权和张丽在《异化之异化:韦努蒂理论再批评》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学者对韦努蒂翻译理论的批评,并借此指出:异化翻译不仅不能抵制我族中心主义和促进民主地缘政治,反而会培养目的语读者的优越感,不利于反对自我文化欣赏;在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上要么适得其反,要么过犹不及;翻译不可能完全成为政治,还有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好的译文必然出自多种策略和方法适度作用的结果等等。^[28]

直接对韦努蒂进行批评的是马会娟的《对Lawrence Venuti 异化翻译理论的再思考》^[29]一文。马会娟不仅指出了韦努蒂的异化理论存在的问题,也指出韦努蒂所提倡的异化翻译可能给中国翻译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给那些翻译水平不高的人从理论上找到借口,打着名正言顺的异化翻译的旗帜制作大量的不“流畅”的劣质翻译作品。马会娟的批评明显受到西方批评者的影响,文中的一些观点也直接引自西方学者,如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和赫曼斯(Theo Hermans)等等。这些批评淹没在归化和异化论的狂热中,其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四) 改造

虽然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论在中国遭到极少的抵抗,但国内在使用时也对其进行了极大程度的改造,“其概念、内涵及应用等方面均被纳入中国国籍、发生了变异”,“这场由韦努蒂异化理论重新引发的归化/异化之争就更具有中国本土色彩,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23]

归化和异化改造的最直接表现是被简化成了翻译的技术转换和具体的操作方法,既包括语言层面,也包括文化层面。例如,郭建中强调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要求译者“在进行语言操作的时候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13]。孙致礼以“纯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界定了归化和异化的“适度”原则,指出“归化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在‘文化层面’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30]。蔡平也认为归化和异化包含语言形式和文化内容两个层面,但这两个层面统一于“归化”的使用中。^[31]同样的论述反复出现在国内的归化和异化论中。与西方学者把翻译看作一种行为不同,国内的这些讨论都基于翻译作为一种技术转换过程的概念前提。

由于在上述两个层面都存在分歧,因而出现了以源语语言文化为归宿和以目的语语言文化为归宿的对立。在语言层面上表现为追求译入语语言规范还是保留源语语言规范以丰富目的语,在文化层面上则表现为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原则和方法。

必须注意的是,与西方译论相比,中国翻译界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被缩小,文化被限定为文本中的文化因素,比如文化词、文化意象、谚语等。西方理论中所包含的翻译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策略、权力关系等因素在国内的归化和异化论中极少涉及。这种狭隘的文化概念和文化翻译观也导致了单纯的归化和异化论。无论是施莱尔马赫的民族意识、贝尔曼的伦理策略,还是韦努蒂理论中的暴力、抵抗、不平等、民族中心主义、精英主义等文化政治色彩以及“以暴制暴”的激进倾向都已经不留任何痕迹。与韦努蒂坚持极端的异化翻译、抵抗式翻译对抗英美国家的归化翻译不同,国内提倡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目的在于文化交流,消除文化隔阂和冲突。至于何种策略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则见仁见智。因此,在对待归化和异化孰是孰非及其应用方面出现了更加辩证、调和的主张。例如,郭建中指出,从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这四个可变因素来考虑,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他认为: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

或采用一种方法。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甚至没有必要再进行“归化”和“异化”的优劣高下之争,就像没有必要再进行“直译和意译”之争一样。^[13]主张异化为主的孙致礼也承认,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32]“目前,国内译界似乎达成了共识,即归化和异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两者在互为补充关系的前提下有关孰主孰次、大势所趋的问题。”^[23]

(五) 改造的原因

对于归化和异化在中国的改造和变异,国内一些学者指出了其中的“误读”“误释”,也有学者批评“套用术语”等急功近利的做法,甚至认为反映了中国译界“对西方译论的膜拜,有急于与国际译论接轨的诉求,内在的焦虑”等现象。这些现象无疑都是存在的,但是单纯以这些现象来解释已经不能令人满意。

一位严肃对待批评观念的批评家永远不能止于简单地说,解释是误解或者借用不可避免地涉及误读。正相反,在笔者看来,完全可以把误读(当误读发生时)看作观念或理论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的历史转移。^{[1]236}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2005年笔者试图用“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这条阐释学原则解释归化和异化在中国的改造。^[33]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中国历史语境的哪些意识“先结构”决定和促成了归化、异化的新阐释和新用法的形成?反之,我们是否也可以把这种改造看作理论或观念对新的接纳环境和接纳条件的屈就?

毫无疑问,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思维方式作用于中国翻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和定势。对国内有关直译/意译、归化/洋化、归化/异化的众多定义进行互文性分析即可发现,以下几种思维方式构成了国内接受归化和异化的“先结构”:

其一,中国文化中的整体性模糊思维和直觉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往往通过印象式、直觉经验把握事物。在中国古典文论中表现为缺乏系统性,术语朦胧、模糊、含混等特点,扎根于中国古典文论的中国译论也体现出这种特点。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不对所使用的术语和概念作词源性和历史性分析,也不会一步一步地对其含义作系统的深入解释。一些学者批评的中国译论“缺乏范式建构意识”“缺乏纯理论研究”“欠缺严密的理论体系”“描写性成果不多”等问题,都与此不无关系。国内一些学者在

定义归化和异化时沿袭这种方式,譬如没有追溯到韦努蒂所指施莱尔马赫的源头和贝尔曼的演绎去弄清其原始意义及其演变过程,也没有结合这些理论所依赖的阐释学、解构主义等理论。此外,在有关直译/意译、归化/洋化、归化/异化的定义和阐释中,反复出现诸如“一般”“一般来说”“大致相当于”“似乎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等一些模棱两可或印象式的表达方式。这与西方学者讲究严密逻辑的分析和思辨方式明显不同。

其二,二元对立与中和的思维模式。在郭建中的采访中,韦努蒂指出,把“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看成对立的概念是一种误解。“在一定程度上,异化翻译也是归化。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25]国内译界不仅把直译和意译、归化和洋化、归化和异化等看作“不是……而是……”或者“要么……要么……”的对立关系,而且在这些术语的定义中把内容和形式、语言和文化、源语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语言文化、作者和读者等对立起来。这些模式导致中国译论始终专注于技术层面的转换,把主体性问题、价值性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都排除在翻译研究之外。因此,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的一些含义,甚至是核心含义都被剥离,在中国的归化和异化论里极少涉及译者主体性、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翻译观念表现出对立中统一的倾向,譬如,“文”与“质”对立和“圆满调和”,内容和形式以及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和统一等。国内译界把归化和异化看作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的关系也沿袭了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

韦努蒂在谈到自己的观点时,批评一些学者把他的概念等同于学者们所熟悉的概念,指出自己的概念事实上不同于纽马克、奈达或尤利娅尼豪斯的术语概念,也不同于当初启发他形成观点的那些理论,比如施莱尔马赫、贝尔曼等人的理论。^[25]在韦努蒂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典型的“生成性”思维模式。按照这种思维模式,理论处于“未完成”状态,其形成主要依赖于语境。施莱尔马赫面对解释的困难以及德国“抵抗法式翻译”的背景提出翻译的两种路径,贝尔曼立足于翻译的伦理目的而突出“异化—直译”翻译,韦努蒂的理论则是在考察英美国家的翻译现象和事实中所形成的,他专注于译者面对某种情形“该怎么办?”“为什么和如何翻译?”。中国译界则表现出一种“去语境化”的思维模式,对概念和理论倾向于“盖棺定论”式的接受。这种模式虚构一种理想的翻译,假设“翻译活动是在真空中

从事的;文本创作也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扰下进行的;语言是透明的、工具性的(而不是主体性的);译者也是价值中立的、公允的;意义是预先设定的,而不是生成的;两个文化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等等”^[34]。因此,在解读中国传统译论思想时表现出对既定概念的接受,漠视概念产生的土壤,忽视诸如“豪杰译”“换例译法”等不忠、不顺的翻译现象和事实。在解读和应用外来译论时既没有联系术语和概念产生的背景,也没有注意它们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国内很多的归化和异化定义出现反复雷同,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在上文中指出,很多观点都无出郭建中1998年一文中的总结。

从语境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归化和异化来到中国后也面临不得被同化、被驯化的情形。在中国国内的翻译研究环境中,意识形态、权力、抵抗、暴力、民族中心主义等话语几乎没有进入中国翻译话语体系。从翻译输入或输出来讲,中国或许属于韦努蒂所说的弱势国家,但中国的语言文化具备非常完善的体系,一向并不自认处于弱势。这与韦努蒂所指英美世界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对抗的情形有所不同。国内译界尚未把翻译上升到民族战略的高度来研究,学者们预测中国翻译将越来越趋向异化,目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无关文化的不平等以及抵抗和文化霸权等因素。

四、结论

西方的归化和异化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遭到极少的抵抗,几乎被全盘接受。早期受国内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和定势的影响,被简化为翻译技巧的转换和具体的操作方法,不仅加入了直译和意译之争,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文本、各种情形的翻译。后期随着中西译论的深入交流,国内逐渐对其正本清源。

根据赛义德的观点,理论在旅行到其他时间或情境的过程中有时会失去原来的力量和叛逆性。^[35]我们发现,西方归化和异化理论来到中国,不仅含义和用法发生了变化,而且应用范围得以扩展,而其原本因与伦理和政治等相关而体现出的叛逆色彩,到了中国的语境中削弱至几乎为零。归化和异化,自身作为翻译跨文化交际理论的一对范畴,显示了理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现象和变异,也促使我们思考:该如何对待西方译论在中国的传播,如何对待理论在跨文化中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Said Edward. *Traveling Theory in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M]//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3rd edition. Translated by Susan Bernofsky. Oxon: Routledge, 2012.
- [3] Berman Antoine. 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 [M]//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3rd edition. Translated by Lawrence Venuti. Oxon: Routledge, 2012:240-253.
- [4]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5] 徐普. 安托瓦纳·贝尔曼翻译理论中的“伦理”问题[J]. *法国研究*, 2011(2):67-75.
- [6]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M]//钱钟书. *七缀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79-118.
- [7]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133-136.
- [8] 王雪, 胡叶涵. 施莱尔马赫对当代西方译论的影响[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5):449-452.
- [9] 王雪, 胡叶涵, 谷婷婷. 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哲学溯源[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3):264-266.
- [10] 王雪, 王立松, 李旭. 施莱尔马赫阐释学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5):473-476.
- [11] 韩宁. 论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的本质与当代发展[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11(2):93-95.
- [12] 陈早. 施莱尔马赫异化翻译观念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12(1):78-80.
- [13] 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和归化[J]. *外国语*, 1998(2):12-18.
- [14]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188-199.
- [15] 郭建中. 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J]. *中国翻译*, 2000(1):49-52.
- [16]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 [J]. *中国翻译*, 2002(5):24-26.
- [17] 崔永禄. 鲁迅的异化翻译理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6):144-147.
- [18] 王东风. 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J]. *中国翻译*, 2008(2):5-10.
- [19] 林克难. 为翻译术语正名[J]. *中国翻译*, 2001(1):14-16.
- [20] 林克难. 外国翻译理论之适用性研究[J]. *中国翻译*, 2003(4):44-46.
- [21] 葛校琴. 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J]. *中国翻译*, 2002(5):32-35.
- [22] 贺显斌. 韦努蒂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误读[J]. *外语教学*, 2008(3):77-80.

[23] 杨红梅. 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J]. 山东外语教学, 2012(3): 30-35.

[24] 蒋晓华, 张景华. 重新解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兼与郭建中教授商榷[J]. 中国翻译, 2007(3): 39-44.

[25] 郭建中. 韦努蒂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08(3): 43-46.

[26] 郭建中. 异化与归化: 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第二版评述[J]. 中国翻译, 2009(2): 34-38.

[27] 刘英凯. 归化——翻译的歧路[M]//杨自俭, 刘学云. 翻译新论(1983—1992).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269-282.

[28] 刘泽权, 张丽. 异化之异化: 韦努蒂理论再批评[J]. 外语研究, 2009(3): 75-80.

[29] 马会娟. 对 Lawrence Venuti 异化翻译理论的再思考[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1): 26-32.

[30] 孙致礼. 翻译: 理论与实践探索[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36.

[31] 蔡平. 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 中国翻译, 2002(5): 39-41.

[32]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 从归化趋向异化[J]. 中国翻译, 2002(1): 40-44.

[33] 尹衍桐. 语境制约与国内的归化/异化论[J]. 外语研究, 2005(2): 61-65.

[34] 吕俊. 对翻译学构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 中国翻译, 2001(4): 6-9.

[35] Said Edward. 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 in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36-452.

责任编辑: 夏畅兰

Traveling Theory: The Dissemination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China

YIN Yantong

(College of Art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Edward Said's traveling theory is used to examine the travel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to China. Wester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have enjoyed great popularity since they were imported into China at the end of 1990s. They have been accepted completely and have promoted the debate of "literal vs. free" translation in China. However, although they encounter little resistance, they have undergone great transformation,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reduction to technical transference, change of "not... but..." category into "either... or..." or "both" category, loss of original ethical and political rebelliousness. Among the various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ir transform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stereotyped thinking mod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ncluding holistic and intuitive thinking, binary opposition and mean thought, and decontextualized way of thinking. This also demonstrates their assimilation and acclimatization under the new accepting conditions.

Key words: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traveling theory; dissemination; transformation